政治科學論叢／第四十期／民國 98 年 6 月／頁 43～80

Waltz 制衡假設之檢視：
以波斯灣三次衝突爲例

陳文生*

摘　要

制衡假設是新現實主義大師瓦爾茲解釋國際體系之權力平衡重複發生的重要根據，然而國際體系在冷戰結束後形成以美國爲主導的單極體系，但其他國際強權卻未對美國權力集中的情形進行制衡。本論文研究冷戰前後發生於波斯灣的三次戰爭，亦發現冷戰後的兩次波灣戰爭中，其他國際強權均未對美國採取制衡行動。本論文分析二級國際強權未在波斯灣進行制衡的原因，並從相對權力地位及體系層次之差異的角度認爲，此等現象尚不足以論證瓦爾茲的理論有誤。此外，本論文也剖析瓦爾茲有關單極體系下之制衡及回復平衡的論述，藉以重新釐清其簡約理論的內涵與特質，同時也探討其他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行爲的解釋，特別是攻－守權衡論、利益平衡論及威脅平衡論等多變因分析，並評估他們對瓦爾茲理論的補充效果。

關鍵詞：瓦爾茲、制衡、權力平衡、結構現實主義、單極體系、波斯灣、美國

*國立高雄大學政法系副教授，E-mail: vincent@nuk.edu.tw
收稿日期：97 年 8 月 6 日；接受刊登日：98 年 5 月 12 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壹、前 言

國際關係理論大師瓦爾茲（Kenneth N. Waltz）所領導之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或稱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自一九七〇年代末起，獨領風騷一二十載。其重要理論貢獻之一爲強化現實主義傳統之權力平衡（balances of power）理論，[1] 並以此爲基礎解釋國際體系變遷，從而強調體系結構對國家行爲之影響。基於權力平衡理論，瓦爾茲預期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的「制衡」（balancing）行爲，乃必然現象；而制衡之發生，正是瓦氏預測國際體系，由權力不平衡回復到平衡狀態的主要依據之一，也是其解釋國際結構變遷的重要立論所在。

然而，在冷戰結束後，特別是蘇聯瓦解後，一些學者根據權力平衡理論，預期其他強權會以軍事結盟或內部軍事建制的方式制衡美國此一唯一超強。可是，制衡現象並未發生，許多支持制衡假設者，乃進入等待時刻，且主張制衡很快會到來、國際體系結構亦將隨之改變。冷戰結束後的十餘年，美國於二〇〇三年三月出兵伊拉克，卻仍未見制衡美國超強的行爲產生。此一新的事實使主張制衡假設者日益難以招架。制衡行爲之遲遲沒來，也使瓦爾茲於一九九三年預期多極體系將在一二十年內取代兩極體系，及美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會以單獨或集體方式制衡美國權力等預測（Waltz, 1993: 52-53），有落空之虞。

依照權力平衡的邏輯，當國際體系之權力分配不平衡時，二級國家會以增強武裝或相互結盟方式，制衡最強大的國家。瓦氏指出：「二級國家，若能自主選擇時，會成群倒向較弱的一方，因爲較強一方才對他們構成威脅」（Waltz, 1979: 127）。冷戰結束及蘇聯瓦解後，美國成爲世界唯一的超強，突顯國際體系之權力的集中或權力分配不均衡現象。依權力平衡原理，美國的優勢及其與其他國家之間的權力差距現象，會造成其他強權的威脅，導致各強權以制衡方式對抗權力之集中，使美國之唯一超強權力無

[1] 瓦爾茲說：「如果國際政治理論有任何獨特之處，那就是權力平衡理論」，參見 Waltz (1979: 11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法維繫。然而本文之研究發現，即便冷戰後之國際權力分配發生明顯變化，美國分別於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三年在波灣發動兩次戰爭，卻都未受到其他強權的制衡；換言之，國際上並未出現制衡美國此一唯一超強所擁有的「未受制衡的權力」[2]（unbalanced power）（Waltz, 2000: 28）。此使得瓦氏之制衡假設受到空前挑戰。此一國際政治現象的發展，是否足以論証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出現異例（anomaly）呢？

制衡現象之未出現，的確對權力平衡理論產生諸多挑戰。一方面許多非現實主義陣營的文獻對瓦爾茲的理論提出批判，甚至認爲現實主義已是過時的理論。[3] 另一方面新現實主義陣營則試圖補強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對於國家行爲的分析採取多變因的解釋；亦即在權力分配變數之外，加上其他影響變數，以解釋國家的制衡行爲，並論證制衡並非國家在權力不平衡狀態下的唯一或普遍的行爲（Christensen & Snyder 1990；Walt, 1987, 1991；Schweller, 1993, 1994）。

國際關係學界對瓦爾茲的制衡假設有採取否定論者，也有修正論或補充論者。而本論文之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主要秉持以下幾點看法。首先，倘若當前國際現象與權力平衡理論之預期顯有不符之處，這意謂該理論之假設有修正與補強空間。因爲，經驗性的事實或例証，是檢視理論最堅強且不可或缺的素材。例如批判瓦爾茲之制衡假設甚爲嚴厲的魏士奎（John A. Vasquez）在一九九七年發表的著名文章，從知識論層次批判現實主義的制衡研究是一種退化性的研究計畫（degenerative research program）(Vasquez, 1997），其二〇〇三年的文章則進一步將焦點轉向以經驗性的正確性（empirical accuracy）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命題（Vasquez, 2003）。此說明魏士奎意識到要批判新現實主義，除了知識論層次的高處交鋒外，更需要落實到以經驗性證據及論述來支持自己的論點。瓦爾茲也認爲，「權力平衡理論應該透過觀察困難的案例予以驗證」（Waltz, 1979: 125）；他

---

[2] 「未受制衡的權力」，乃瓦爾茲形容冷戰後美國權力的用語，此也點出瓦氏承認美國權力未受到制衡。

[3] 瓦爾茲在其 2000 年文章中（2000：5）開宗明義地指出以下對現實主義嚴苛批判的代表性文章：Lebow (1994); Legro and Andrew (1999); Russet (1993); Schroeder (1994); Vasquez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也援引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論點認爲，「如果權力平衡（現象）未產生，則該理論之假設是錯誤的」（Waltz, 1979: 120）。本論文研究三次波灣衝突的經驗性案例，並據以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即期望在制衡假設之論戰中提供一個經驗性的註腳。同時，本文也將解釋兩次波灣衝突中，二級國際強權未對美國採取制衡之原因。

其次，瓦氏之結構現實主義，強調國際體系決定國家行爲，然而他對冷戰後國際體系特徵的解讀及預期發生誤判，[4] 而致引發學界對其理論主張的質疑。不過，瓦爾茲對體系特徵的誤判是否等同於否定了他的理論呢？再者，即便瓦爾茲承認蘇聯瓦解後，國際體系型態是單極體系而非兩極體系，然而依據瓦爾茲的理論，弱勢一方理應聯合起來對抗最強大者，以防止霸權之產生。所以，冷戰後美國與伊拉克的衝突對峙當中，其他強權應該支持處於弱勢的伊拉克，以反制美國的行爲，但兩次波斯灣戰爭卻不然（相關論證將於第參部分分析）。若是如此，則本文探討之波斯灣案例是否足以成爲使權力平衡理論發生動搖的例證呢？

第三，瓦爾茲認爲國際政治理論是處理結構對國家的壓力，而非國家會如何回應這些壓力（Waltz, 2000: 27）。換言之，瓦爾茲認爲其理論是處理體系層次的理論，而非國家的對外行爲。值得吾人討論的是，瓦爾茲不處理國家的制衡行爲（balancing behavior），則其理論可以解釋體系的平衡結果（balanced outcomes）嗎？國家的制衡行爲是不是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

第四，冷戰結束已二十載，尚未如瓦爾茲所預期的出現制衡現象，則吾人該如何解讀或解釋此種狀況？本文將探討新現實主義文獻的解釋與補充，及評估這些修正理論是否達到補強瓦爾茲之理論的目的。再者，軟制衡可以解釋傳統制衡之未出現嗎？這也將在本文討論之列。

歸納言之，筆者認爲在理論爭辯過程中，實際的案例及新發生的事實，常能爲特定主張提供很好的支持基礎。自一九八〇年以來的三次衝突（包括發生於一九八〇至一九八八年之兩伊戰爭、一九九一年之第一次波灣戰爭，及二〇〇三年之第二次波灣戰爭），正好跨越冷戰之前後及歷經

[4] 瓦爾茲承認蘇聯滅亡後之國際體系特徵並非兩極體系，而是單極體系（Waltz, 2000: 2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九一一事件之發生，藉著在同一區域但不同時期發生的衝突，作爲檢驗瓦氏之制衡假設的實證研究案例，可從中發現及比較出波灣區域衝突在跨越不同時空所呈現的變與不變，從而檢視權力平衡理論解釋這些變化的能力。事實上，當前學界對瓦氏的理論雖有許多討論，但少有系統性地以波斯灣區域衝突作爲檢討案例的。因此，本文以此三案例檢視瓦氏之制衡假設，期待能增加案例探討上的貢獻。再者，本文將探討制衡現象未發生之原因，並重新釐清瓦爾茲之權力平衡理論的特性，且針對新現實主義內部對權力平衡理論之補充與修正的相關文獻進行討論與分析，企盼藉由案例與理論的對照與討論，得到一些心得與啓發。

本文之論述共分爲以下五個部分：壹、前言；貳、單極體系、制衡假設與美國；參、制衡假設與三次波灣衝突；肆、制衡假設之檢視與評估；伍、結論。

貳、單極體系、制衡假設與美國

探討美國超強的國際行爲，及其他強權對美國權力之反應，首先須從國際體系層次探討一些問題：現在的國際體系結構是什麼？結構現實主義如何解讀當前之國際體系特質？究竟國際體系在冷戰結束後，發生了什麼變化？國際體系是兩極體系（bipolarity），多極體系（multipolarity），或單極體系（unipolarity）？九一一事件後，國際體系結構是否產生變化？國際體系結構如何影響美國超強在波灣區域的行爲？制衡假設與美國強權行爲之關係爲何？以下分就上述問題，分三個主題予以分析。首先，分析結構現實主義對冷戰結束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其次，探討當前體系結構對美國之制約；最後，解讀制衡假設與美國強權行爲的關係。

一、結構現實主義對冷戰後國際體系結構之解讀

瓦爾茲是結構現實主義之先驅，其學派特徵在於強調國際體系結構論述。然而，冷戰結束後的國際體系結構變化，反倒使結構現實主義理論遭到頗大挑戰。

冷戰後，瓦爾茲不認爲兩極體系已崩解。他在一九九三年的文章中堅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持說，蘇聯崩解後，「兩極體系仍持續」（Waltz, 1993: 52），且預測德國（或某一西歐國家）、日本及中國，會在十年至二十年內躍升爲強權（Waltz, 1993: 50）。他也基於權力平衡理論而預期，美國以外之其他國家會以單獨或集體的方式制衡美國的權力。換言之，瓦爾茲認爲冷戰結束及蘇聯之瓦解，並未使兩極體系結構產生根本改變，而且他預期其他國際強權會採取行動制衡美國的權力，而多極體系亦將在一二十年內取代兩極體系，成爲新的國際體系特徵。

與瓦爾茲有類似論述的學者或以「單極時刻」（the unipolar moment）（Krauthammer, 1990/91），或以「單極幻影」（the unipolar illusion）（Layne, 1993）等名詞，來形容冷戰後的國際體系特徵，以顯示美國獨強的局面只是短暫現象，而多極體系即將來臨。米爾謝墨（John J. Mearsheimer)也直接了當的說：「國際體系不是單極體系」（Meausheimer, 2001: 381），因爲「隨著冷戰之結束，國際基本結構沒有改變」（Meausheimer, 2001: 362）。由上述，固然冷戰結束、蘇聯瓦解，但結構現實主義者均否認單極體系之來臨。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也於一九九九年跟進，支持國際體系並非單極體系的看法。他提出一超多強的「單一多極體系」（uni-multipolar system）概念，並認爲國際體系會形成反霸聯盟，制衡美國此一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Huntington, 1999）。

然而，瓦爾茲本人在歷經十餘年，苦等制衡現象及多極體系不成後，終在公元二〇〇〇年時改口，接受國際體系已轉爲單極體系的事實。他說：「基於蘇聯的滅亡，國際政治體系已經變成單極」（Waltz, 2000: 27）。他也稱美國擁有「未受制衡的權力」（unbalanced power）（Waltz, 2000: 28）。亦即，瓦氏承認冷戰後之國際體系特徵並非兩極體系，而是單極體系；而且，國際上並未產生制衡美國超強的舉動。

二、當前國際體系結構及其對美國行為之制約

蘇聯瓦解後，國際體系結構由兩極體系轉爲單極體系。九一一事件後，美國基於反恐安全，採取「布希主義」（Bush Doctrine），展現其霸權意志，在國際上進行領導，充分發揮其單極權力。吾人需從此一國際體系結構的認知著手，方能合理解釋美國對波灣區域的政策作爲。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雷納（Christopher Layne）認爲，單極體系是指單一強權成爲地緣政治上之主宰，其權力大到足以阻止敵對之壓倒性制衡聯盟的形成（Layne, 1993: 5）。沃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指出，單極體系是某一國家的權力太大，以致無法予以反制的結構（Wohlforth, 1999: 9）。盱衡美國於冷戰後在國際體系中的權力地位，符合單極強權的定義。

其實早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史荃基（Susan Strange）就從安全、生產、金融及智識等四個相關聯的結構權力面向，分析一九八〇年代後半之美國權力，認爲美國並未衰微（Strange, 1989: 161-76）。而布朗（Chris Brown）以上述四面向分析冷戰後的美國權力，認爲美國在各面向均仍獨占全球鰲頭（Brown, 1997: 179-80）。論者甚至認爲，從冷戰結束開始，美國與其他國家之軍事及經濟權力差距有拉大現象（Brooks & Wohlforth, 2002）。朴申（Barry R. Posen）更指出，美國控制全球陸、海、空及太空等公共領域（Command of the Commons），促使美國具有全球的軍事優越地位（Posen, 2003: 8-19）。顯然，美國具有全球超強的權力，而瓦解後的俄國及其他世界強權，均不足以產生壓倒性的制衡力量，以反制美國。當前國際體系結構爲單極體系，殆無疑義。

體系結構之「極」（polarity）的變遷，會影響國家如何提供自己的安全（Waltz, 2000: 5）。依權力平衡理論之邏輯，冷戰後美國自冷戰時期兩極結構之束縛中解放，成爲不受制約的強權，而有相當大的政策裁量空間（Mastanduno, 1997: 56）。在冷戰時期之兩極體系結構下，美國必須回應體系之限制，所以一貫地支持世界上反蘇聯或反共產主義之政權。而在單極體系下，因國際限制已解除，美國之干預政策可較爲隨性且間歇地進行，對於干預失敗之成本及聲譽也較不擔心（Mastanduno, 1997: 56-57）。所以，相對於兩極體系時期，美國在單極體系下較能隨心所欲。

不過，權力與領導之間並無必然的連結，霸權國有強大的力量，並不代表它一定會將權力向海外投射（Keohane, 1984: 34-35）；美國在冷戰後具有單極權力，並不代表它會遂行霸權作爲。事實上，美國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揭櫫「布希主義」，才正式將美國之單極權力與霸權意願做了連結（陳文生，2005a）。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制衡假設與美國強權

在瓦爾茲的思維中，權力平衡理論中的制衡假設與強權行爲有何關係？制衡因素可能對美國超強產生什麼影響呢？瓦爾茲強調，強權行爲會受到「制衡」因素的約束，因此體系結構會導致「現狀強權」之出現。因爲，強權一旦顧慮他國或他國組成之聯盟會採取制衡手段，而危及其安全時，則該強權不會任意採取擴張性政策。

瓦爾茲指出：「各國家所首先關心的，不是追求權力極大化，而是維持他們在體系中的地位」（Waltz, 1979: 126-27）。瓦氏固然認爲國際體系是一「競爭性體系」（competitive system），但他基於國際體系之「權力平衡反復成形」的特性，而主張國家不會膨脹權力地位（Waltz, 1979: 128）。因爲，權力平衡理論認爲，「組織是因敵人而建立，其組成是爲了對抗所感受到的威脅」（Waltz, 1993: 75）。因此，「二級國家，若能自主選擇時，會成群倒向較弱的一方，因爲較強一方才對他們構成威脅」（Waltz, 1979: 127）。瓦氏的思維是，強權因擔心其擴張性或侵略性的行爲導致反霸聯盟之形成，而對權力的追求有所節制，所以不會無限度的追求權力（Schmidt, 2004: 435）。

史耐德（Jack Snyder）支持瓦爾茲的論調，並認爲侵犯性現實主義（aggressive realism）提出強權會透過擴張而取得安全的主張，是一種「帝國的迷思」，也違背權力平衡理論。他指出，各國會組成防衛聯盟遏制侵略國之擴張，或進行預防性侵略以阻止重大威脅行動之發生（Snyder, 1991: 1-13）。亦即，國際制衡之存在，使強權受到制約，而不至於一味地擴張權力。葛瑞可（Joseph M. Grieco）也提出，國家是「防衛性的立場主義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s）（Grieco, 1997: 166-168, 186），以支持「現狀強權」的主張。

歸納而言，瓦爾茲從制衡假設得到「現狀強權」的結論。當不平衡發生時，國家或國家組成之聯盟會對較強大者施以制衡，所以強權會以安全爲重而不輕舉妄動。瓦氏基於權力平衡理論而主張國家會追求「安全」極大化，不會追求「權力」極大化。他認爲，國際無秩序使各國想採取制衡措施。當強大國家出現時，較弱的各國會組成反制聯盟；而強權顧慮反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聯盟之出現，不會無休止的追求權力極大化。亦即，強權會擔心制衡之發生，而不採取擴權行動。吾人套用瓦氏之假設，則美國是否以軍事手段介入波斯灣區域，將會受制衡因素存在與否的影響；若不預期有制衡發生，則軍事手段可能成爲美國波灣政策的選項。下一部份將進一步以波斯灣的實例，探討此一主題。

參、制衡假設與三次波灣衝突

瓦爾茲強調，體系的權力平衡特性，導致強權追求安全極大化，但不會追求權力極大化，因爲強權擔心受威脅國家們採取反霸的制衡手段，反而危及自己的安全。瓦氏認爲，權力平衡是一再重覆發生的現象（Waltz, 1979: 128, 1993: 53, 2000: 27），「不是特殊而短暫的情況」（Waltz, 1993: 53）。換言之，受威脅的國家所採取的制衡行爲，在體系發生不平衡時一定會自動出現；而強權評估將遭到制衡時，會採取現狀政策，不進行擴權行爲。

吾人歸納制衡假設的幾個命題如下：(1)制衡是國家的普遍行爲趨勢；(2) 強權擔心因擴權而遭到制衡，所以會以安全爲考量，不追求額外的權力；(3)國家會加入弱勢一方以制衡強勢一方，因爲強勢一方構成威脅，亦即，潛在霸權會遭到其他國家之反擊。

根據瓦爾茲之制衡假設，推演出與本論文主題相關的兩個命題：

1. 基於安全極大化的假設，美國唯有預期不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介入波斯灣；
2. 基於弱勢一方會結盟以制衡強勢一方的假設，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之聯盟，對於美國軍事介入波灣，會採取制衡措施。

本文以跨越冷戰前後的三次波斯灣衝突——包括兩伊戰爭（冷戰前）及兩次波灣戰爭（冷戰後）—— 爲例，探討美國在波斯灣的作爲及其他強權對美國之反應，藉以檢視瓦爾茲之制衡假設。以下分述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兩伊戰爭

基本上，波斯灣區域在英國於一九七一年撤軍後，迄伊朗一九七九年伊斯蘭革命前，主要是由美國所支持之伊朗，與蘇聯所支持之伊拉克兩大區域強權對抗之態勢（陳文生，2001：13-14）。此時期美國對波灣採行「尼克森主義」（Nixon Doctrine），將波灣區域的安全委由伊朗（及沙烏地阿拉伯）負責，而不直接駐軍，以免重蹈越戰之覆轍（Acharya, 1989: 21-23；Tavakkoli, 1995）。但伊朗爆發何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領導之伊斯蘭革命後，一方面新政權之反美態度及伊朗人質危機發生，使美伊交惡，「尼克森主義」亦煙消雲散；另一方面，伊朗以激烈手段推動「輸出革命」（export of revolution）政策，試圖推翻伊拉克及沙烏地阿拉伯等波灣鄰國之世俗政權，致突顯其稱霸波斯灣的企圖。爲因應此一發展，伊拉克於一九八〇年九月引爆延續長達八年的兩伊戰爭。

事實上，美國自一九七九年底蘇聯大舉入侵阿富汗後，即改採「卡特主義」（Carter Doctrine）。卡特總統表示：「任何試圖控制海灣區域的外力，將視爲是對美國之重大利益（vital interests）的攻擊，美國對於此種攻擊將以包括武力在內的任何手段予以排除」（Carter, 1980）。此彰顯卡特政府對蘇聯在該等區域之擴張，採取圍堵政策（周煦，2001：97-129）。

基本上，美國對於兩伊戰爭的政策，也正受到冷戰時期兩極體系之美蘇對抗的制約。在美蘇對抗下，美國之波灣政策重點在於，不讓兩伊之任一國倒向蘇聯或讓蘇聯在該區域擴張。一方面，蘇聯與兩伊之接觸比美國深，所以在蘇聯因素影響下，美國擔心幫助任何一邊，會將另一邊推向蘇聯；另一方面，美國不願見到兩伊在戰爭中有任何一方獲得明顯勝利。從當時的情勢分析可知，伊朗在革命後本就與美國交惡，而相對與蘇聯較親近；至於伊拉克勝利可能導致伊朗分裂及蘇聯干預該國（Acharya, 1989: 126-128）。所以，美國對於兩伊戰爭基本上是採取讓兩強彼此對抗、相互消耗的政策（陳文生，2001：135-136），藉此避免波灣區域產生單一霸權。至於蘇聯在兩極對抗思維下，既想維持與伊拉克的關係，也不願伊朗戰敗，而導致伊朗之親西方政權取代伊斯蘭革命政權。

由兩伊戰爭的案例可知，美國與蘇聯之波灣政策都受到彼此制衡之影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響，兩大超強對兩伊戰爭之官方態度都採中立政策，但也試圖使波灣之權力平衡有利於己；不過，雙方始終未有直接的軍事介入行動。事實上，兩伊戰爭成爲延宕多年的消耗戰，除了區域層次之權力結構問題，更受到國際兩極體系之結構限制的影響。

由上述分析，美國對於兩伊戰爭之情勢，因與蘇聯相互制衡，因此未採直接軍事介入政策。此符合瓦爾茲之制衡假設。

二、第一次波灣戰爭

兩伊戰後，波灣區域權力態勢呈現倒向伊拉克的不平衡狀態；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使此種不平衡情勢更形加重。一九九〇年八月二日凌晨，伊拉克十萬軍隊跨越科威特邊界，隔日即佔領、控制及併吞科威特。伊拉克之區域霸權企圖，及波灣區域之不平衡狀態至爲明顯。

針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美國是否採取反制行爲呢？美國於科威特危機爆發後數日即展開「沙漠盾牌行動」（Operation Desert Shield），派軍隊駐防沙烏地阿拉伯；九月六日時，美軍部署在沙國、波灣及紅海人數已超過十萬（周煦，2001：206）。此無疑是美國採取制衡伊拉克擴張的初步作爲。一九九一年元月十六日，美國進一步率領多國部隊執行「沙漠風暴行動」（Operation Desert Storm），對伊拉克執行空襲及全面地面作戰，於歷經四十餘天後擊敗伊拉克軍隊，將之逐出科威特境內。

從國際體系層次而言，美國在準備發動第一次波灣戰爭時，是否認爲將會遭到制衡？而美國出兵後是否遭到其他國際強權制衡？事實上，美國因應科威特威危機之發生，除派兵至波灣外，也進行各種外交穿梭，特別是於十一月下旬推動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聯合國安理會第六七八號決議（UNSC, 1990）。該決議獲得十二票贊成通過，世界主要強權包括法、英及美國於冷戰時的敵人蘇聯都支持對伊拉克動武；中國投棄權票但未否決該案。第六七八號決議之通過，意味著如果伊拉克未依決議於期限內撤軍，則美國對其動武會獲得國際社會支持，而不至於受到世界主要強權之制衡。因此，美國預期其對伊拉克動武，不僅不會受到主要強權制衡，更會獲得國際社會以實際行動支持作戰。

以此案例與制衡假設之兩大命題相互對照的結果爲：首先，美國預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兵伊拉克不會受到制衡，因此最後採取軍事手段介入矯正波灣之權力不平衡態勢；吾人可說，這點尚符合制衡假設中之國家會在無制衡顧慮下從事軍事行動。其次，美國之出兵伊拉克，不僅未受到世界主要強權制衡，反而受到支持，這與制衡假設似有落差。事實上，從權力平衡角度，冷戰結束後之國際體系的權力結構往美國傾斜，其他國際強權理應聯合抵制較強大之美國才對；但國際局勢之演變顯然不是這樣。更且，國際社會係透過聯合國之「集體安全」（collective security）制度，對伊拉克用武，更與權力平衡理論不可同日而語。

依權力平衡理論，在多極體系中之其他行爲者，只會將破壞平衡之行爲者打敗，而不會將之殲滅。凱普蘭（Morton Kaplan）指出，權力平衡體系（即多極體系）之行爲規則是要讓戰敗國重回體系，以免因主要行爲者之降低而造成體系之不穩定（Kaplan, 1957: 22-24, 27）。很明顯地，美國之出兵波灣，主要目的是確保伊拉克不再具有威脅能力，並非要以武力推翻海珊政權；所以，美國在戰況勢如破竹之下，並未乘勝追擊至巴格達（周煦，1990：219-224）。其實，美國是試圖讓戰後的波灣，維持伊拉克與伊朗兩強互相牽制的格局（陳文生，2005b：7），這部分符合權力平衡的假設。

三、第二次波灣戰爭

明顯地，美國於二〇〇三年對伊拉克出兵，並非因爲伊拉克有爭奪霸權行爲，或者波灣區域產生不平衡狀態。其實，美國發動的是一場「預防性戰爭」（preventive war）；既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也不合乎聯合國憲章及國際習慣法（陳文生，2003b）。如前所述，美國在第一次波灣戰後，未擊潰伊拉克，讓波灣仍維持伊拉克與伊朗兩強對峙牽制的格局。然而，波灣區域未出現失衡狀態，美國爲何出兵呢？美國出兵有否預期會遭到制衡？美國出兵後是否受到制衡？

無疑地，美國於發動戰爭前試圖透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對伊拉克動武的過程，受到法、俄、中等強權之阻撓。包括美國於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間曾試圖讓可能引發對伊動武之「暗藏板機」（hidden trigger）條款在第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中闖關，但遭到法俄中三大強權在安理會牽制，而使該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議無法構成對伊拉克直接動武的授權。此外，美國於二〇〇三年二月進一步試圖讓聯合國繼一四四一號決議之後，通過一明確授權對伊動武的決議，但仍遭到法俄中之反對；法國更表明將否決任何包含最後通牒或自動用武之決議案（陳文生，2004：24-29）。但美國無視於其他國際強權之反對，以「伊拉克自由行動」（Operation Iraqi Freedom），逕行對伊拉克動武、推翻海珊政權、控制伊拉克領土。

基本上，小布希（George W. Bush）於二〇〇二年元月發表內含「邪惡軸心」（axes of evil）論之國情咨文後，就開始有系統地強調，要以推翻海珊政權之方式，解除伊拉克之威脅（陳文生，2004：24-25）；他更在二〇〇二年九月之聯大演說中，具體而強烈地表達美國不排除主動解決伊拉克之威脅（White House, 2002a）。而第一四四一號決議通過後，美國白宮幕僚長卡德（Andrew Card）在被問及一旦伊拉克未遵守該決議後美國之用武程序時表示：「我們不需要他們（指聯合國）的允許」（Reuters, 10 Nov. 2002）。由此，美國對於解決伊拉克問題之急迫感及單邊主義傾向，至爲明顯，且在出兵前也未對其他強權會否進行制衡有所顧忌。

事實上，世界其他強權雖不願美國出兵伊拉克，但對於其軍事介入波斯灣，並無具體的制衡行動。雖然各強權在聯合國安理會一四四一號決議案中阻撓美國提議之動武授權，但這都僅止於政治上的折衝，並非權力平衡假設所認定之具體的軍事制衡。[5]

將第二次波灣戰爭之案例，與制衡假設對照後可知，美國因不擔心受其他強權軍事制衡而斷然出兵，此與制衡假設相符；然而其他世界強權在戰前及戰後均未具體對美國實施軍事上的制衡，因此未印證制衡假設之預期。

其實，美國之出兵伊拉克，不是基於波灣區域的權力不平衡，而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擔心恐怖主義團體經由流氓國家取得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致有發生災難式恐怖主義（catastrophic terrorism）的「緊迫危險」（imminent threat）。小布希總統基於美國在反恐時代之威脅來源改變，而改採「先制」

[5] 有學者提出，美國試圖出兵伊拉克之過程，曾遭到其他強權之軟制衡（soft balancing），並認爲此爲制衡之一種類型。但筆者反對此一見解，相關討論，將於第肆部分第四節申論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preemptive）攻擊戰略；伊拉克正是其應用此戰略的案例。他指出，美國的反恐作戰不是以防衛取勝，必要時需採取「先制」的行動（White House, 2002b）。小布希於二〇〇三年三月十七日向海珊下最後通牒之演說中也指出，若在恐怖主義敵人先發動攻擊之後才做回應，並非自衛，而是自殺；而美國有使用武力以確保其國家安全的至高權力（White House, 2003）。由此可知，美國出兵伊拉克之行爲，主要是自我安全之考量，而且其行爲也未遭到其他強權之制衡。

四、結果與發現

根據三次波灣衝突中美國在波灣之作爲，及其他強權之反應，檢証制衡假設之兩大命題，得到結論如下（請另參閱表 1）：

表 1　美國軍事介入波灣與制衡假設

項目 / 時期	衝突名稱	美國採取軍事介入	美國預期將受制衡（第一項命題）	美國行動遭到制衡（第二項命題）	符合制衡假設
冷戰時期	兩伊戰爭（1980～1988）	否	是	——	是
冷戰後	第一次波灣戰爭（1991）	是	否	否	否
9/11 後	第二次波灣戰爭（2003）	是	否	否	否

資料來源：作者依內文研究結果整理

第一個命題：美國預期不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介入波斯灣。此項命題在三個案例中都獲得印證。三次波灣戰爭衝突中，美國在兩伊衝突時，因顧慮蘇聯之反制而採平衡政策，未有直接軍事介入；至於第一次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則都是在無制衡之虞而出兵。簡言之，瓦爾茲強調強權基於安全極大化考慮，在有制衡之虞下不會貿然出兵；美國在此三次衝突之行爲合乎此一預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二個命題：國際體系中之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之聯盟，會採取制衡美國之措施。依前述論証，兩伊戰爭可以支持此項命題，但第一次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卻無法印證此一命題。換言之，瓦爾茲所預期之強權或強權組成的聯盟，會制衡美國的現象，並未在兩次波灣戰爭出現，因此其假設與實際現象之發展有所出入。

肆、制衡假設之檢視與評估

由前述之檢証發現，瓦爾茲之制衡假設，可以解釋美國在三次波灣衝突中之出兵與否的考慮，以及美國在兩伊戰爭（發生於冷戰時期）中對制衡的顧慮。但冷戰結束後的兩次波灣戰爭中，其他強權卻未發生制衡美國的作爲，此等現象對瓦爾茲的理論造成什麼樣的衝擊？瓦爾茲及新現實主義如何解釋制衡之未出現的狀況？此處將分析兩次波灣案例中制衡現象未出現的原因，並針對本文在前言提出對瓦爾茲理論的諸多疑問，逐一討論，包括：瓦爾茲對冷戰後的體系特徵解讀有誤，是否足以論證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有誤？瓦爾茲如何解釋冷戰後制衡未出現的現象？瓦爾茲認爲其理論是處理體系層次的理論，而非國家的對外行爲，然而，不處理國家的制衡行爲，其理論可以解釋體系的平衡結果嗎？單極體系會維持多久？單極體系下的制衡何時會出現？瓦爾茲以外的新現實主義對制衡假設做了哪些補充，這些補充解釋能否對瓦爾茲的結構理論產生補強作用？有學者將傳統制衡的定義擴充至包含軟制衡，但軟制衡與現實主義所強調之制衡概念相通嗎？以下將依序分析之。

一、兩次波灣戰爭未發生制衡之原因

固然包括瓦爾茲在內的學術界人士普遍同意，冷戰後的國際體系由兩極體系走向單極體系。然依照權力平衡理論，即便是在單極體系下，仍是會發生制衡現象的，否則體系如何轉變，權力平衡又如何能重複出現呢？就本文探討冷戰後的兩次波灣戰爭而言，制衡美國之行爲何以沒有發生？以下從國際體系結構型態、超強的意志、同盟關係、二級強權的國家利益及意識型態等面向予以探索。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從國際體系的結構型態而言，單極體系特徵可以對制衡現象之未發生做部分解釋。相較於兩極體系，冷戰後的單極體系可以解釋爲何美國的國際行動較不受到羈絆，而且在區域衝突處理中居於主導地位。而對於二級國際強權而言，冷戰結束代表美國超強之勝出，體系結構的轉折形成美國與其他國家在權力上的懸殊差距，他們在無法抗衡美國之情況下，而未採取制衡行爲。簡言之，從體系結構的解釋角度，單極體系使美國超強在國際上的行動游刃有餘，也在波灣的區域衝突處理中居於主導，而此一結構也迫使其他強權無法予以制衡。就一九九一年的波灣衝突而言，英、法等歐洲強權不僅未制衡美國，反而採取偎大邊政策向美國靠攏，包括支持聯合國安理會第六七八號對伊拉克動武決議，並出兵參與美國爲首之多國部隊，共同對抗相對弱勢的伊拉克。至於蘇聯與中國雖沒配合參與軍事行動，但既未杯葛聯合國決議，更無制衡之作爲。[6] 而針對二〇〇三年的美伊戰爭，其他國際強權充其量只是基於正當性考量，而反對由安理會通過授權出兵的決議，但並無採取軍事上制衡之行爲。

其次，超強的意志會影響美國與其他強權的互動。一九九〇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後，老布希總統揭諸「世界新秩序」（New World Order）的理念，表達美國希望透過與其他國家合作及共同分擔責任的方式，解決爭端，維護世界秩序。代表美國雖是世界唯一超強，但仍願意以多邊合作的方式進行領導。在此一背景下，歐洲支持美國之出兵，蘇聯消極配合，中國不杯葛。但美國在遭受九一一攻擊後，小布希基於反恐安全而採取「布希主義」，強調以單邊行動維護其國家安全，於是美國的霸權意志使單極體系之權力差距的特徵更爲明顯。美國既不在乎其他強權是否支持，也不認爲其他強權會有制衡動作，於是，在聯合國未授權且其他強權反對之下仍堅決發動第二次波灣戰爭。而其他國際強權在面對美國貫徹意志的決心，也更認清無能力對抗美國的單極權力。

第三，同盟關係會影響制衡之運作。其實，歐洲強權是美國的長期盟邦，俄國與中國也都與美國簽訂戰略伙伴關係，因此除非波灣區域次體系

[6] 針對第 678 號決議，中國投棄權票，蘇聯則投贊成票。而「沙漠風暴行動」共有 34 國參與，日本及德國雖未出兵，但提供金源。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衝突，會影響各國之重大利益，否則他們不會對美國霸權之干預伊拉克進行制衡，以免與美國發生正面對抗。尤其是歐洲強權，他們與美國在國際總體系的結盟，主要是要對抗國際層次的潛在敵人，且其安全仍須美國之保證與協助，並不至於因爲區域次體系的問題，而與俄中等強權進行結盟以制衡美國。

第四，二級強權的國家利益。第一次波灣戰爭，各國在波灣的共同石油利益，有助他們採取向美國靠攏的偎大邊行爲，以便與美國共同行動、共享利益。第二次波灣戰爭時，二級強權除英國外，因考慮對伊拉克作戰不具正當性，而不願配合出兵。但基於美國的行動並不會危及到他們的國家安全，而且美國也不至於把西方盟邦在波灣的石油利益等全部搶走，這使得他們雖反對出兵伊拉克，但也不採取制衡的作法。

第五，意識形態因素。在總體系層次的意識型態而言，西方基督教文明的自由民主體制，與東方回教文明的專制獨裁政體之爭，使歐洲強權不易與伊拉克結盟而對抗美國。至於俄國與中國，一方面其宗教文明與回教世界有所不同，另方面他們在經濟改革開放及政治現代化上，日益受美歐國家意識型態之影響。所以從意識型態上看，二級強權在沒有重大利益攸關的情況下，要與有獨裁惡名的伊拉克海珊政權結盟，去對抗代表主流意識型態的美國，並不容易。

依上述之分析，二級國際強權未制衡美國之出兵伊拉克，主要受體系結構、強權意志、同盟關係、國家利益及意識型態等因素之影響。換言之，二級強權對波灣衝突之行爲，除了受體系層次的因素影響外，也受到體系內之因素的影響。其實，二級強權在次體系的行爲，雖受總體系結構之制約，但仍有相當的活動空間。吾人比較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三年兩次波灣衝突可以發現，同樣處於單極體系的結構下，但二級國際強權對於美國的出兵行爲，卻有截然不同的作法。在一九九一年時，歐洲強權積極支持，蘇聯與中國未反對；在二〇〇三年時，則二級強權中除了英國之外，幾乎都反對。由此可知，二級強權在區域次體系的行爲，較不受體系結構的限制，而可以有一些行動空間。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瓦爾茲對制衡之解釋

由本文所探討之案例可知，即便瓦爾茲承認冷戰結束之後的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但他所預期的制衡行爲並未出現。似乎體系結構的問題解決了，但制衡假設仍無法令人信服。因爲擺在眼前的國際體系不平衡狀況，從冷戰結束至今已經二十年了，但制衡行爲卻遲遲沒發生。難道制衡真的不見了？瓦爾茲及新現實主義者如何解釋所謂平衡的中斷（balance disrupted）或遲緩的制衡（sluggish balancing）呢？[7]

㈠波灣案例與制衡假設

瓦爾茲未能正確解讀冷戰後之國際體系由兩極轉向單極，致其理論遭到質疑。迦帝斯（John Lewis Gaddis）認爲，瓦爾茲最大的弱點在於無法解釋結構變遷。他指出原因說，如果體系結構反映各單元之間的權力分配，而如果權力分配的變化會改變體系結構的話，除非這些權力的改變是來自體系內國家的權力變化，否則吾人難以得知這些變化從何而來（Gaddis, 1992/93: 34）。沃佛斯（William C. Wohlforth）也指出，瓦爾茲對體系變遷之處理不佳，以致論者以冷戰結束後之國際體系批評結構現實主義（Wohlforth, 1994/95: 92）。吾人認爲，瓦爾茲之理論無法充分解釋體系結構之變遷，使其未能正確認知冷戰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爲單極體系，也因此無法解釋爲何美國在冷戰後的兩次出兵波灣，均未受到其他強權的制衡。瓦爾茲於二〇〇〇年的文章中指出：「基於蘇聯的滅亡，國際政治體系已經變成單極」（Waltz, 2000: 27）。此乃承認其一九九三年文章對國際體系特徵轉變的誤判。

不過，即便瓦爾茲對冷戰後之國際體系結構特質的解讀有誤，以致制衡行動未出現，但並不代表其理論之錯誤。依照權力平衡理論的邏輯，縱使體系處於不平衡的狀態下，制衡行爲並不必然是相對弱勢國家應付最強國家之權力的唯一行爲選項。換言之，制衡行動在某段時間沒發生，並不代表否定了權力平衡理論，也不足以推論瓦爾茲所建構的國際政治理論是

[7] 「平衡的中斷」及「遲緩的制衡」，是瓦爾茲在 2000 年文章中的用詞（Waltz, 2000: 27, 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錯誤的。瓦爾茲在其一九七九年之「國際政治理論」一書中即指出，制衡並非政治行爲的普遍模式（Waltz, 1979: 125）。他認爲，政治行爲者的行爲選項並不以制衡彼此（balance each other）爲限，也可能採取偎大邊（climb on the bandwagon）行爲，此端視體系結構而定。他指出，當體系中無領導者時，一些未來可能的領導者之間會進行競爭，於是其中的某一些人會組成聯盟去牽制其他人的進展。但這是群龍無首的情況下才會發生的。只要眼看其中有人要成爲贏家時，幾乎所有人都會偎大邊，而非建立聯盟以防止贏家取得權力。於是，偎大邊（而非制衡）就成爲典型的行爲（Waltz, 1979: 25-26）。

依瓦爾茲之理論見解，若是在無明顯領導者的狀況下，體系中的國家會在競爭中發生制衡行爲；若是預期有贏家出現，則其他各國會採取向領導國靠攏的偎大邊行爲。由此可知，依瓦爾茲之理論原意，制衡並非是國家在權力不平衡之國際體系中唯一的對外行爲，反而是當領導國出現的當時，偎大邊將成爲各國普遍的行爲模式。其實，瓦爾茲在一九九三年文章中之所以預期國際體系會產生制衡行爲（預期其他國際強權會制衡美國），而非偎大邊行爲，此乃瓦爾茲忽略冷戰後之國際體系特徵已轉變爲單極體系的事實所致。換言之，是他未能正確判斷國際體系特徵之轉變，而致在推論其他國際強權行爲時產生誤差，並非其權力平衡理論本身出現問題。依瓦爾茲前述的理論邏輯，蘇聯之瓦解代表美國成爲贏家，其他國際強權會靠向美國而非制衡美國，因此本文探討之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三年的兩次波灣戰爭中，美國以外的國際強權都沒有制衡美國的行爲，這樣的行爲模式並不違背前述瓦爾茲在一九七九年之著作所建立的理論推論。也就是說，瓦爾茲預期國家在不平衡狀態下並不以採取制衡行爲爲限，也有可能採取偎大邊的行爲，因此即便冷戰後的兩次波灣戰爭未發生制衡美國的現象，但尚不足以論證瓦爾茲理論的錯誤，而權力平衡理論也不因此而遭到否定。

再者，總體系與區域次體系之層次有別，次體系的事實發展是否可以驗證或否定總體系的法則呢？本文研究之波灣兩次衝突未出現制衡現象，是發生在區域次體系的層次，則這兩個案例是否足以否定瓦爾茲的總體系理論呢？此問題的重點在於：美國對伊拉克之出兵，會不會使國際體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內產生相對權力地位之變化，以及美國之出兵會不會使體系變成不平衡。首先，國際體系型態在冷戰後就已經成爲以美國超強爲主導的單極體系，所以美國在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三年之出兵行爲，並無意也不會改變國際強權間之權力地位的變化，而是採行現狀政策（陳文生，2005b：4-6）。其次，國際體系形成權力集中於美國的不對稱現象已是既定事實，不會因爲美國的出兵而導致體系形成新的不平衡。易言之，美國作爲單極超強，其出兵伊拉克是一種現狀政策，目標是在維持既有的領導地位，而不是要改變體系的現狀。因此，本文探討之兩次波灣衝突中，雖其他國際強權未採取制衡美國的行爲，而與制衡假設有所出入，但兩個案例的發展並不至於牽動總體系之相對權力地位或體系型態的改變，因此不盡然能印證總體系之運作規則出問題，也無法據以否證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

不過，瓦爾茲雖同意蘇聯瓦解後的國際體系是單極體系，也指出制衡並非國家面對不平衡體系的唯一行爲。可是依權力平衡理論，即便是單極體系也會發生反霸制衡。然而冷戰後之單極體系爲何沒發生制衡美國強權的現象？以下進一步分析瓦爾茲的解釋。

㈡制衡時機與體系之平衡

就本文探討之案例可知，國際體系隨著冷戰結束而產生不平衡的第一時間裡，其他強權未有制衡美國的動作。於是，如本文第二部份所述，瓦爾茲等人退而求其次地企盼遲來的制衡。他們所謂「單極時刻」（unipolar moment）的用語，亦形同「等待制衡的時刻」（The Moment of Waiting for Balancing）。瓦爾茲支持「單極時刻」的主張，並認爲新的平衡正在慢慢形成（Waltz, 2000: 30）。然而他如何解釋此一「等待時刻」呢？

瓦爾茲指出，冷戰後雖未出現制衡美國的狀況，但那只是體系平衡的「中斷」（disrupted），某一天就會恢復的（Waltz, 2000: 27）。可是，單極時刻何時結束？如何解釋他所指稱的「遲緩的制衡」呢（Waltz, 2000: 27）？哪一國或哪一群國家有物質力量及政治意志，使「單極時刻」終結呢？瓦爾茲解釋說，理論只能讓吾人知道新的權力平衡會形成，但無法知道要花多久時間；此乃國內及國際的情境（conditions）決定的（Waltz, 2000: 30）。他認爲現實主義與其他社會科學理論有一樣的侷限性，亦即，比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能夠得知將發生什麼事（what will happen），較難回答何時會發生（when it will happen）。因爲，國際政治理論處理的是結構對國家的壓力，而非國家將會如何回應這些壓力（Waltz, 2000: 27）。

固然，瓦爾茲迴避當前美國獨強之單極體系會維持多久的問題，但作爲結構論者，必然要處理當前單極體系的結構型態如何轉變的問題。依照權力平衡的邏輯，單極體系是不平衡的體系型態，此一型態終將結束，而體系也會回復到平衡狀態。但問題是，單極體系如何終止？體系的平衡如何達成？制衡行爲是否爲體系達成平衡之必要條件？體系的不平衡狀態，有賴制衡之出現予以矯正，但瓦爾茲不處理國家層次的制衡行爲，則如何解釋體系層次之達成平衡？

瓦爾茲認爲單極體系不會維持太久的理由有二：(1) 主導強權在海外執行太多任務，長期而言會削弱自我；(2) 即便主導強權的行爲溫和且節制，但較弱國家仍會擔心其未來的行爲及其未受制衡的權力，因此某些國家會試圖自我增強力量，或與他國結盟，以便將國際的權力分配帶到平衡狀態（Waltz, 2000: 30）。

由第一個理由觀之，瓦爾茲採納了「霸權興衰論」的角度，預言美國之過度付出，會腐蝕霸權的主導地位，使單極體系消失。瓦爾茲認爲，美國試圖保持單極體系之永續存在注定要失敗，因爲美國爲了維持領導地位所執行的任務，會超出其所擁有的經濟、軍事、地理及政治資源。由此，瓦氏對於體系結構變遷之解釋，除了權力平衡邏輯外，亦加入霸權衰微論，作爲其體系理論的補強。不過，如果單極體系之消失是因爲霸權之自我衰微所致，此表示體系結構的變遷是因爲體系內國家之權力變化所致；亦即，體系內國家之權力變化，會導致體系之相對權力分配的改變，而使體系結構產生改變。就此而言，究竟是體系制約單元，還是單元層次可以促成體系的改變？如果單元可以影響體系，則瓦爾茲是不是背離了結構現實主義的論述呢？瓦爾茲認爲，結構會影響單元，而單元也會影響結構，也因爲如此，國際政治的模糊性無法解決。但只要單元層次或結構層次之因素只是影響（affect）而非決定（determine）結果，就不會背離新現實主義；畢竟理論無法去除政治的不確定性，而只是幫助我們理解它而已（Waltz, 1990: 36-37）。而且作爲結構解釋者，縱然發現結果（outcomes）同時受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到結構及單元層次的影響，也不必問單元層次的變化如何影響結果（Waltz, 1990: 37）。

從第二個理由觀之，則體系之達成平衡，仍有賴國家採取制衡行爲。但是，制衡是不是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呢？瓦爾茲認爲，美國爲了維持霸權地位所做的努力，正是破壞其霸權地位之最確定的方法。因爲，美國爲了維持主導地位的作法，會激起其他國家想克服這種情況，這樣就會形成體系的權力平衡（Waltz, 2000: 36-37）。其實，就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的邏輯，不論單極強權是否自我衰弱，制衡勢必會產生的，因爲其他國家會抗拒霸權維持既有之地位，而做出使體系回復平衡的作爲。固然在回復平衡的過程中，制衡並非國家的唯一行爲，但結構會迫使制衡行爲出現，而制衡之發生將使體系走向平衡。但是，若沒發生制衡，則體系是否可能達成平衡？李維（Jack S. Levy）指出，若依克勞德（Inis L. Claude）的分類，瓦爾茲之體系平衡論是屬於「自動的」平衡（Claude, 1962: 43-46），因此主張平衡的結果不必然需要國家的制衡行爲；亦即，瓦爾茲認爲制衡並非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李維亦分析指出，平衡的結果及制衡的行爲，有可能只出現其中之一：有可能制衡出現了，但因制衡失敗而形成霸權狀態（即不平衡的結果）；也可能沒有真正發生制衡，但各國因害怕遭到制衡，而形成無霸權之結果（Levy, 2003: 133）。

然而，國際體系恢復平衡的因果過程是什麼？瓦爾茲遭批評只預測體系會達成平衡，卻沒有處理其如何發生；亦即，瓦爾茲只預測結果，但欠缺分析結果發生之因果過程。李維認爲，理想的權力平衡理論，應該既預測結果，也能預測國家的制衡行爲（Levy, 2003: 132-133）。其實就社會科學方法論而言，本就會產生解釋模式上的全列式（idiographic）與代表式（nomothetic）的抉擇與侷限性。前者試圖窮盡某一行爲背後的所有條件，以便對該行爲進行完全解釋；後者是要找出最重要的因素，對某一行爲作一般化的解釋。瓦爾茲不僅是後者，而且他的理論更是簡約式的（parsimonious）結構理論，主張國際關係與國家行爲只能被單一變數所解釋，而這個變數就是無秩序的國際體系結構。

結構論者認爲有看不到的結構（unobservable structures）存在，結構的影響方式雖是間接的，但卻是影響體系運作及體系內成員行爲的重要因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素。從瓦爾茲的角度，國際政治體系的結構就是體系的組織性或次序性的原則，國家行爲及體系結果的變化是因爲體系本身之改變的結果，而體系改變之主要決定因素就是結構。他認爲國際政治體系的次序原則是無秩序狀態，在此一無秩序結構下，體系層次之變化（例如極的變化）才是重要的影響因素，體系內或單元層次的因素並不重要。因此，瓦爾茲的理論，著重在解釋體系的趨勢及結構性變化，而不在於解釋細節、短暫的現象或單元層次之行爲。也因此他認爲冷戰後國際強權之未制衡美國的現象，突顯現實主義理論與社會科學理論的共同侷限在於，只能告訴吾人方向，但沒辦法預測時間。依照瓦爾茲的解釋，國際政治體系的本質是無秩序，只要這樣的結構特徵不改變，則國家行爲者自然會採取使體系走向權力平衡的行爲，而國際體系終究會回復到平衡狀態。

三、制衡行為之多變因分析

瓦爾茲在二〇〇〇年發表之文章，承認國際政治體系變成單極體系，但認爲單極體系不會維持太久，因爲各國在面臨未受制衡的權力時，會試圖增加自我權力或彼此結盟，以便將國際的權力分配帶回至均衡狀態（Waltz, 2000: 28）。固然瓦爾茲辯護說，當前國際體系終究還是會產生制衡現象，而使體系結構由單極變成多極。即便如此，制衡之遲來，仍與權力平衡理論的原始期待有所落差。如前節之分析，瓦爾茲只告訴我們體系終究會回歸到平衡，也對單極體系之消失及制衡之出現分別提出解釋與預期。但在單極體系尚未消失，及體系尚未回歸平衡之前的這段時間裡，如何解釋國家的行爲及國際政治運作呢？其實，瓦爾茲只解釋並預期制衡現象會出現，卻沒有解釋制衡沒有出現的原因。亦即，沒有解釋單極體系之制衡爲何沒發生？冷戰後的不平衡狀態下爲何沒有出現制衡美國權力的情形？再者，瓦爾茲以結構層次分析爲理由，只強調結構因素對國家行爲的制約，並迴避對體系內國家之制衡行爲的解釋，但是國家的制衡行爲除了受結構因素制約外，不受其他因素影響或驅動嗎？

瓦爾茲以外的許多新現實主義學者對國家的制衡行爲提出了多變數的分析。克里斯湯森（Thomas Christensen）與史奈德（Jack Snyder）的攻—守權衡論（offense-defense balance）認爲，影響受威脅國家決定採取制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衡行爲與否的因素，除了權力分配之外，尚包括其對攻勢—守勢策略的判斷及得失權衡；他們認爲，受威脅國家並非一定會採取制衡，反而有可能在權衡利弊得失後，採取推諉卸責的作法（pass the buck）而導致霸權之出現，或者走向大會串（chain-ganging）而導致戰爭（Christensen & Snyder 1990）。沃特（Stephen M. Walt）的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認爲國家之制衡行爲，不只是制衡其他國家的權力，在決定制衡時會考慮這些權力的威脅性大小（Walt, 1987: 21, 25, 28-32；1991: 53）。換言之，沃特認爲國家的制衡行爲固然很普遍，但主要是制衡威脅的來源，不一定是制衡較強大的權力。史威勒（Randall Schweller）的利益平衡論（balance of interests）認爲，二級的現狀國家可能因害怕改變現狀聯盟之權力太大、難以與之抗衡，而不與防衛聯盟結盟，他們也可能因貪圖利益而依附強勢（bandwagoning），此皆使制衡無法成形（Schweller, 1993, 1994）。

簡言之，上述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行爲的多變數分析，是在相對權力分配因素之外，各別從國家之策略思考、利益考慮及威脅來源等變數著手，對於制衡現象之未出現做補充解釋。他們的解釋，不僅對國家在不平衡體系下的行爲做了合理的詮釋，也對於分析及掌握國家之對外行爲有理論上的貢獻；而且，他們在解釋制衡現象之未出現的同時，也補充了瓦爾茲結構論之單一解釋變項的侷限性。不過，上述作者的補充解釋都不夠結構，而與瓦爾茲的結構理論有些落差。

首先，上述新現實主義者對制衡行爲的變數分析是在解釋國家的行爲或國家的外交政策，而非瓦爾茲所強調的體系的分析。瓦爾茲認爲國家行爲受體系中之權力分配的影響，並預測體系總是會形成平衡。他指出，權力平衡理論是在解釋體系之重複形成平衡，與任何個別單元之意圖或動機無關；不論國家之目的是要維持某種平衡，或是要追求全面統治，權力平衡都會形成（Waltz, 1979: 119）。瓦爾茲認爲，只要國際體系是自力救濟體系，則國家因害怕不自力救濟會使自己處於危險之中而遭殃，就會刺激他們做出導致權力平衡的行爲。所以，權力平衡理論不需要有理性假設或行爲者的意志（Waltz, 1979: 118）。瓦爾茲之體系平衡論，是「自動的」（automatic）平衡（Claude, 1962: 43-46），無關乎個別國家的動機或意圖（Waltz, 1979: 119-120）。自動的權力平衡理論主要是用於解釋國際體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爲何形成平衡，而不在於個別國家爲何會採取制衡或是否採取制衡（Elman, 2003: 10）。無論是攻—守權衡論、利益平衡論或威脅平衡論，均在權力分配因素之外，加上影響國家行爲動機的變數。他們的分析，雖仍強調權力分配對國際體系之權力平衡的影響，但也導入國家動機與策略對體系平衡的影響性，而與瓦爾茲有所區隔。

其實，以多變因來解釋國家行爲，固然可爲國家未採取制衡行爲的原因進行解釋，但這些影響國家行爲的因素，卻不是體系結構層次的，也因此與瓦爾茲的體系理論不太契合。從瓦爾茲的結構論角度，各個國家都是功能相似的單元（liken units），只要結構相同，則國家的行爲就會有相似性（Waltz, 1979: 105, 123）。如果國家的對外行爲，因不同的動機或因利弊得失的權衡而有所不同，則國家之行爲是受體系內（in the system）因素的影響，而非瓦爾茲所強調之體系的（of the system）變化。以克里斯湯森與史奈德的攻—守權衡論而言，如果國家之攻—守策略的考量會影響其對外行爲，則吾人如何辨明體系之結構型態對國家行爲的影響，以及國家的行爲究竟是受體系結構或國家之策略思考的影響？另外，史威勒強調國家會爲了利益而不進行制衡，並認爲國家的行爲主要受到恐懼及貪婪的程度所驅動。由此，國家的行爲是受內在因素的影響者大，此與瓦爾茲之強調外在結構的影響有些落差。又如沃特，認爲國家會制衡威脅的來源，而非權力大小。則此是否意味著即便體系處於不平衡狀態下，只要權力大者不具威脅性，就不會遭到制衡。若是如此，則體系如何回復到平衡狀態？如果不平衡的權力或壓倒性的權力不一定代表威脅，以致不一定成爲制衡的對象，則這種主張符合權力平衡理論的邏輯嗎？

上述之討論連結到第二個問題：國家的制衡行爲是針對權力，還是針對威脅？瓦爾茲認爲，壓倒性權力必然遭來制衡。像美國擁有當前之未受制衡的權力，即便抱持良善的動機而行爲，其他國家仍視之爲威脅（Waltz, 2000: 28）。因爲，權力很容易濫用，權力之集中會引發不信任（Waltz, 2000: 29）。雷納指出，在單極體系中的相對權力分配是極度不平衡的，所以有資格成爲世界強權者，有增加相對權力之結構性壓力，因爲若不取得強權能力，則可能遭霸權之剝奪（Layne, 1993: 12-13）。換言之，單極體系的不平衡結構會促使二級強權增加權力。他進一步指出，在單極體系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家會制衡霸權之未受牽制的權力，此突顯在單極體系中，制衡「威脅」與制衡「權力」並無明顯區分，所以其他國家必須擔心霸權之「權力」，而非「意圖」，因爲威脅就在於霸權的「權力」（Layne, 1993: 13）。

沃特的威脅平衡論，試圖以「威脅」概念涵蓋瓦爾茲等人之「權力」論述。他認爲國家之制衡行爲是對威脅的反應；威脅之內涵包括國家之總合的權力資源、地理鄰近性、攻擊能力及侵略意圖等（Walt, 1987: 21, 25）。國家會制衡最大威脅者，而非權力最大者。各國的結盟選擇，會受威脅的不平衡（imbalances of threat）的影響；當某國家或聯盟特別具危險性時，各國會組成聯盟或增強自我力量，以降低脆弱性（Walt, 1987: 263-265）。依此邏輯，國家之制衡或結盟對象的選擇，不只是考慮權力大小問題，還會基於威脅來源而做決定。依此威脅平衡論的邏輯，主導性強權是否遭到制衡，至少有一部份要視該強權的外交政策而定（Mastanduno, 1997: 60）。沃特認爲，被視爲具侵略性的國家，可能激起其他國家之制衡（Walt, 1987: 25）。他指出，世界其他國家對美國感到不滿意的，不只是美國的權力，還包括其政策（Walt, 2005: 106-110）。由此，美國是否會遭到制衡，與其外交政策作爲是否被其他強權解讀爲具威脅性有關。另外，米爾謝墨認爲，冷戰後沒有形成制衡聯盟以對抗美國，是因爲美國沒有在西半球以外追求霸權的衝動，因此降低其所造成之威脅（Mearsheimer, 2001: 380-382）。依照米氏的解釋，只要美國沒有追求霸權而致構成威脅，就不會遭到制衡。則米氏某種程度接受了威脅平衡論，而否定「權力構成威脅」的說法。

馬斯坦督諾（Michael Mastanduno）指出，威脅平衡論之解釋，把焦點放在權力分配及單元層次之外交政策意圖與行爲上。因此，其理論之增進尚需專注於研究威脅之意圖及偏好（Mastanduno, 1997: 86）。然而，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一項重大差別在於，前者強調權力能力，後者強調意圖及偏好（Baldwin, 1993: 7-8）。這是否意謂著，威脅平衡論在修正權力平衡理論的同時，也向新自由主義方向跨出了一步呢？而且過於重視體系內的因素，也形同與瓦爾茲之強調體系論述的結構論漸行漸遠。

此外，不管是基於權力或威脅的考量而制衡，都涉及結盟與合作的問題。然而，新現實主義的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說，與結盟的論述卻不免有衝突之處。新現實主義者葛瑞可（Joseph M. Grieco）認爲，國家不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論是進行結盟以制衡權力或威脅，或決定是否與他國合作，均是以相對利益爲考慮，且無秩序社會中的欺騙問題會阻礙國家間的合作(Grieco, 1993: 116-142）。既是如此，基於相對利益及欺騙問題的顧慮，可能使結盟產生困難，那麼透過結盟以進行制衡的行爲也可能受到阻礙。依此推演，則制衡假設與相對利益說相容嗎？這是新現實主義必須進一步細膩處理的問題。

四、軟制衡之評估

針對冷戰後制衡現象未出現，有一些學者提出「軟制衡」概念來解釋。沛柏（Robert A. Pape）與保羅（T. V. Paul）認爲，制衡現象是存在的，只是二級強權在冷戰後並非以傳統上之「硬制衡」方式（即軍事建置及結成作戰聯盟等），直接挑戰美國的軍事優勢，減損美國之權力；而是以國際制度、經濟手段及外交安排等非軍事手段來延遲、阻撓及破壞美國的單邊軍事政策（Pape, 2005: 7-45；Paul, 2005: 46-71）。此種論點，乃試圖將國際體系之制衡行爲做延伸及放寬解釋，並以軟制衡行爲作爲連結硬制衡的過渡現象，藉以化解實証現象與制衡假設之間的落差。總之，他們認爲冷戰後雖未發生硬制衡現象，但軟制衡行爲之出現，代表主要強權正在對美國進行初步的制衡，而且，此種軟制衡有演變爲硬制衡的可能性(Pape, 2005: 9-10；Paul, 2005: 46-71）。

然而，傳統之硬制衡未發生的原因是什麼呢？沛柏提出了三項解釋。第一，美國長期以來就是主要強權制衡超級強權的明顯例外，其主要原因是美國有不侵略國際主要強權的美譽，而不是因爲美國相對於其他強權擁有壓倒性的權力；過去美國打過許多仗，但基本上是用權力保持區域的現狀，而非試圖主宰某區域。第二，對主要強權而言，採取硬制衡手段與美國直接對抗的成本太高、風險太大；但軟制衡措施已在施行，並構成對美國制衡的初步階段。第三，如果美國持續追求侵犯性的單邊主義政策，則軟制衡手段可能會使用得更密集，甚至演變成硬制衡（Pape, 2005: 9-10）。

歸納而言，沛柏認爲當前其他強權對美國的制衡是存在的，只是現在仍處於軟制衡階段；而制衡的產生，並非因爲美國具有壓倒性權力，而是導因於美國政府當局的政策作爲。吾人認爲，沛柏以美國政策之良善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否，來解釋制衡是否發生，與瓦爾茲的權力平衡邏輯有差異，而與沃特之強調制衡威脅來源的邏輯相似。權力平衡理論認爲，在權力的不平衡狀態，強大的權力本身就會構成威脅，與政策良善與否無關；亦即，權力本身就是威脅來源，所以會遭到制衡，與某國的政策無必然關係。所以，即便沛柏的軟制衡論，可以說明當前單極體系下的部分現象，卻與瓦爾茲之制衡假設的邏輯不甚一致。

其次，軟制衡概念是否足以取代或解釋遲來的硬制衡呢？萊柏（Keir A. Lieber）與亞歷山大（Gerard Alexander）質疑軟制衡概念在定義及操作化上有其困難，且根本無法與一般的外交摩擦做嚴格區分；更且目前被標明爲類似軟制衡的一些行爲，其實美國在過去沒有被制衡時期就曾發生了（Leiber & Alexander, 2005: 109, 139）。也就是說，軟制衡概念所指涉的內涵，難以與一些常態的外交行爲區隔，而且所謂的軟制衡行爲，並非冷戰後的獨特現象。

布魯克斯（Stephen G. Brooks)與沃佛斯同樣也指出，軟制衡概念與外交折衝（diplomatic bargaining）有難以分辨的盲點（Brooks & Wohlforth, 2005: 104-106），也認爲一些美國與盟邦的不和諧狀況，或盟邦有違背美國政策目標的舉動，在美蘇對立的兩極時代就有類似情況發生（Brooks & Wohlforth, 2005: 75-77）。他們對軟制衡論者最致命的挑戰是，軟制衡論者所提之軟制衡現象，究竟與美國之體系性的權力集中，有無因果關聯性；亦即，其他強權的軟制衡行爲，是否是爲了牽制潛在霸權、反制美國權力之集中（Brooks & Wohlforth, 2005: 78-79）。以俄土德法等國之反對美國發動二〇〇三年伊拉克戰爭爲例，他們的研究顯示，上述國家的反制行爲，都不是在回應美國權力對其安全之挑戰；德國與土耳其是因爲國內政治因素，俄國乃經濟利益考慮，法國受其政策偏好、長期談判利益及國內與歐洲政治等考慮的影響（Brooks & Wohlforth, 2005: 93-104）。

如上所述，軟制衡概念在定義上，難以與外交摩擦或政策折衝等行爲做嚴格區分。事實上，當前國際體系所產生之所謂軟制衡現象，無法證明是面對權力集中之安全威脅所做的因應措施，尤其，所謂的軟制衡行爲只是在挫折美國的政策，而且可以用安全威脅以外的因素解釋其發生（亦即他因解釋），則其因果推論必須大打折扣。終究，軟制衡所談的只是外交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層次，與傳統制衡所強調之軍事建置、作戰結盟相去甚遠；而外交行爲的效果，與瓦爾茲所謂的體系制衡，或權力平衡所談的生存與安全威脅問題，尚有一段距離，也跳離了制衡假設的原本邏輯。無可否認的，不論是否支持軟制衡論，大家至少有兩點共識：一、所謂的硬制衡，並未在當前國際體系中出現；二、硬制衡的出現，才真正符合權力平衡邏輯。

伍、結　論

本論文以冷戰前後發生之三次波斯灣衝突，探討美國超強的行爲及其他強權的反應，並藉三個實證案例檢視瓦爾茲的制衡假設，及重新釐清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同時，本文也檢視其他新現實主義對於制衡假設的詮釋，並分析他們的解釋方法與瓦爾茲的差異，及評估這些補充解釋是否達到補強瓦爾茲之理論的目的。

首先，本論文以三次波灣戰爭驗證制衡假設，得到結論如下：第一個命題：美國預期不會受到制衡，才會以軍事介入波斯灣。此項命題在三個案例中都獲得印證。三次波灣戰爭衝突中，美國在兩伊衝突時，因顧慮蘇聯之反制而採平衡政策，未有直接軍事介入；至於第一次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則都是在無制衡之虞而出兵。簡言之，瓦爾茲強調強權基於安全極大化考慮，在有制衡之虞下不會貿然出兵；美國在此三次衝突之行爲合乎此一預期。第二個命題：國際體系中之主要強權或強權組成之聯盟，會採取制衡美國之措施。依本文之論証，兩伊戰爭可以支持此項命題，但第一次及第二次波灣戰爭，卻無法印證此一命題。換言之，瓦爾茲所預期之強權或強權組成的聯盟，會制衡美國的現象，並未在兩次波灣戰爭中出現。

本文分析發現，一九九一年及二〇〇三年之兩次波灣戰爭中，二級國際強權對美國出兵伊拉克行爲未予以制衡，主要是受體系結構、強權意志、同盟關係、國家利益及意識形態等因素影響。本文也發現，二級強權在波灣區域次體系之行爲，雖受體系結構影響，但可以有一些行動空間。也因此，在兩次波灣戰爭中，雖同樣是處於單極體系下，但二級強權的行爲卻有很大不同。

固然在兩次波灣戰爭中未出現制衡美國的現象，而似與制衡假設有所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入。但本論文認爲，瓦爾茲原本就預期，國家在不平衡狀態下並不以採取制衡行爲爲限，也有可能採取偎大邊的行爲，因此即便冷戰後的兩次波灣戰爭未發生制衡美國的現象，但尚不足以論證瓦爾茲理論的錯誤，而權力平衡理論也不因此而遭到否定。再者，總體系與區域次體系之層次有別，因此，本文探討之兩次波灣衝突中，雖其他國際強權未採取制衡美國的行爲，但兩個案例的發展並不至於牽動總體系之相對權力地位或體系型態的改變，因此不盡然能印證總體系之運作規則出問題，也無法據以否證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不過，瓦爾茲的制衡假設似只能預期制衡行爲必然會在體系不平衡的狀態下出現，但卻無法充分解釋制衡未出現的原因，也無法預期制衡將在什麼條件下出現。

再者，本文重新探究瓦爾茲的自動平衡理論，並認爲此乃源自其簡約式的結構理論。就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的邏輯，不論單極強權是否自我衰弱，制衡勢必會產生的，因爲其他國家會抗拒霸權維持既有之地位，而做出使體系回復平衡的作爲。固然在回復平衡的過程中，制衡並非國家的唯一行爲，但結構會迫使制衡行爲出現，而制衡之發生將使體系走向平衡。瓦爾茲的簡約論主張國際關係與國家行爲只能被無秩序的國際體系結構所解釋，因此從結構的解釋角度，只要無秩序結構存在，則制衡必然發生。而且，瓦爾茲之體系平衡論是屬於「自動的」平衡，因此平衡的結果不必然需要有國家的制衡行爲出現；亦即，制衡並非體系平衡的必要條件。然而，瓦爾茲的理論，著重在解釋體系的趨勢及結構性變化，因此有許多現象仍無法解釋，而形成理論的侷限。例如瓦爾茲面對當前單極體系尚未消失及體系尚未回歸平衡期間，其攸關國家行爲及國際政治運作的解釋，就顯得難以施展。

其他新現實主義者試圖對制衡行爲採取多變數分析，因此在相對權力分配因素之外，各別從國家之策略思考、威脅來源及利益考慮等變數著手，試圖協助解釋國家在體系不平衡狀態下的行爲或制衡現象未出現的原因，這些研究包括攻—守權衡論、利益平衡論及威脅平衡論等。本文發現，他們的研究雖提出合理的解釋，也頗有理論貢獻，但因延伸至探討國家行爲，特別別是涉及國家的意圖及動機，此乃單元層次的分析，而顯得不夠結構，也因此與瓦爾茲的結構理論有些落差。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另外，針對冷戰後制衡現象未出現，有一些學者提出「軟制衡」概念來解釋。但本文分析指出，軟制衡是外交層次概念，與傳統制衡所強調之軍事建置、作戰結盟相去甚遠；而外交行爲的效果，與瓦爾茲所謂的體系制衡，或權力平衡論所強調的生存與安全威脅問題有落差；更重要的是，軟制衡分析者似未能對軟制衡現象與美國權力不平衡之間做出較具說服力的因果解釋，亦即解釋所謂的軟制衡是在冷戰後的獨特現象，且是爲了制衡美國的單極權力而起的。

其實，瓦爾茲的理論是一體系完整、邏輯嚴謹的理論。縱然冷戰後的國際政治變化，使學界對他的理論產生諸多質疑與批判，但他的結構論述迄今仍站得住腳。不過，瓦爾茲的權力平衡理論未來所將面對的挑戰，仍是國際政治現象的發展與其理論是否相符的問題。特別是，其理論如何因應經驗性的異例。無疑地，新現實主義在冷戰後面對國際體系結構變遷及制衡現象之未出現，遭到頗大挑戰。而新現實主義陣營也對冷戰後的現象提出諸多解釋，從瓦爾茲的結構論到其他學者之採取多變因分析等。然而值得關注的理論性問題是，新現實主義在解釋或包容新現象的過程中，其理論擴充是否以其核心假設爲基礎而進一步予以豐富化，抑或是爲了包容或挽救經驗性的異例，而動搖了基本假設以致偏離新現實主義的軌道？這是一個值得持續觀察與探討的議題。

參考書目

一、中文部分

周　煦，2001，《冷戰後美國的中東政策：1989-2000》，臺北：五南圖書公司。

陳文生，2001，《伊朗伊斯蘭共和國之海灣政策，1979-1993》，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陳文生，2003a，〈伊朗接受聯合國安理會第 598 號決議之決策分析〉，《問題與研究》，42(2): 115-134。

陳文生，2003b，〈先制攻擊？美國出兵伊拉克之正當性與影響評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局變動中的台灣政治學術研討會」論文（12 月 13-14 日），台北：台灣政治學會。

陳文生，2004，〈美國推動聯合國安理會第 1441 號決議之政策分析與評估〉，《問題與研究》，43(3): 23-48。

陳文生，2005a，〈九一一後美國之霸權治理策略：以伊拉克爲例〉，《政治科學論叢》，23: 169-200。

陳文生，2005b，〈布希政府反恐安全戰略及其挑戰：伊拉克經驗的檢討〉，《政治科學論叢》，25: 1-28。

二、英文部分

Acharya, Amitav. 1989. *U.S. Military Strategy in the Gulf: Origins and Evolution under the Carter and Reagan Administrations*. London: Routledge.

Baldwin, David A. 1993. “Neoliberalism, Neore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ed. David A. Baldw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8.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2. “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81(4): 20-34.

Brooks, Stephen G.,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2005. “Hard Times for Soft Balan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7-108.

Brown, Chris. 1997.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ampshire: Macmillan Press Ltd.

Carter, Jimmy. 1980. *The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January 23, 1980.

Christensen, Thomas J. and Jack Snyder. 1990.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4(2): 137-168.

Chubin, Shahram. 1982. *Security in the Persian Gulf: The Role of Outside Powers*. London: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tudies.

Claude, Inis L., Jr. 1962.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andom House.

Elman, Coli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 1995. “History vs. Neo-realism: A Second Loo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 182-195.

Elman, Colin. 2003. “Introduction: Appraising Balance of Power Theory.” 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ds.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22.

Gaddis, John Lewis. 1992/93.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3): 5-58.

Grieco, Joseph M. 1993. “Anarchy and the limits of Cooperation: A Realist Critique of the Newest 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In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ed. David A. Baldwi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16-142.

Grieco, Joseph M. 1997.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s.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Colorado: Westview Press, 163-201.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2): 35-49.

Kaplan, Morton A. 1957. *System and Proces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Inc.

Keohane, Robert O. 1984. *After Hegemony*.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uthammer, Charles. 1990/91. “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70(1): 23-33.

Layne, Christopher. 1993. “The Unipolar Illusion: Why New Great Powers Will Ris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4): 5-51.

Lebow, Richard Ned. 1994. “The Long Pea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d the Failure of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8(2): 249-277.

Legro, Jeffrey W. and Andrew Moravcsik. 1999. "Is Anybody Still a Realis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2): 5-55.

Leiber, Keir A. and Gerard Alexander. 2005. "Waiting for Balancing: Why the World Is Not Pushing Back."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109-139.

Levy, Jack S. 2003. "Balances and Balancing: Concepts, Propositions, and Research Design." 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ds.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128-153.

Mastanduno, Michael. 1997. "Preserving the Unipolar Moment: Realist Theories and U.S. Grand Strategy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4): 49-88.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Pape, Robert. 2005. "Soft Balancing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7-45.

Paul, T. V. 2005.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0(1): 46-71.

Posen, Barry R. 2003.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s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8(1): 5-46.

Reuters, 10 November. 2002. <http://www.reuters.com/home.jhtml;jsessionid>

Russet, Bruce.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iples for a Post-Cold War Pea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chmidt, Brian C. 2004. "Realism as Traged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427-441.

Schroeder, Paul. 1994. "Historical Reality vs. 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108-148.

Schweller, Randall L. 1993. "Tripolarit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37: 73-103.

Schweller, Randall L. 1994.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72-107.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range, Susan. 1989. “Toward a Theory of Transnational Empire.” In *Global Changes and Theoretical Challenges,* eds. Ernst-Otto Czempiel & James N. Rosenau. Massachusetts: Lexington Books, 161-176.

Tavakkoli, Seyed Mohsen. 1995. “United States Perception of Persian Gulf Security.” *Echo of Islam,* January.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1990. Resolution 678,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2963rd meeting on 29 November 1990.

Vasquez, John A. 1997. “The Realist Paradigm and Degenerative vs. Progressive Research Program: An Appraisal of Neotraditional Research on Waltz’s Balancing Propositio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1(4): 899-912.

Vasquez, John A. 2003. “The New Debate on Balancing Power: A Reply to My Critics.” In *Realism and the Balancing of Power: A New Debate*, eds. John A. Vasquez and Colin Elman. New Jersey: Pearson Education Inc, 87-113.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 Stephen M. 1991. “Alliance Formation in Southwest Asia: Balancing and Bandwagoning in Cold War Competition.” In *Dominoes and Bandwagons*, eds. Robert Jervis and Jack Snyd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1-84.

Walt, Stephen M. 2005. “Taming American Power.” *Foreign Affairs* 84(5): 103-120.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Random House.

Waltz, Kenneth N. 1990.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44: 21-37.

Waltz, Kenneth N. 1993.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2): 44-79.

Waltz, Kenneth N. 1996.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6(1): 54-57.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White House. 2002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12, Whitehouse Web: http:// 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20020912-1.html.

White House. 2002b.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West Point, Whitehouse Web: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2002/06/ 20020601-3.html.

White House. 2003.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March 17, Whitehouse Web: 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s/ 2003/03/ 20030319-17.html.

Wohlforth, William C. 1994/95. “Realism and the End of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3): 91-129.

Wohlforth, William C. 1999.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4(1): 5-4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Examining Kenneth Waltz's Balancing Assumption:

Case Studies of Three Conflicts in the Persian Gulf

*Wen-Sheng Chen**

Abstract

The balancing assumption is the hard core of Kenneth N. Waltz's explanation of how systemic balances of power form recurrently. Although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ystem has become unipolar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great power balancing against US's unbalanced power has yet to occur.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ree Persian Gulf conflicts and finds that great powers did not engage in balancing against US during the two Persian Gulf conflicts that broke ou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 paper analyzes why balancing behavior was absent, and suggests that this phenomenon is insufficient to falsify Waltz's theory mainly because the conflicts occurred at the regional subsystem level as opposed at Waltz's structural level of analysis.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examines Waltz's arguments about balancing behavior and balanced outcomes in order to gain a clearer understanding of his parsimonious theory. The paper also discusses other neorealist explanations of balancing behavior, especially the theories of offense-defense balance, balance of interests, and balance of threats, and evaluates whether they could complement Waltz's theory.

Keywords: Kenneth N. Waltz, Balancing, Balance of Power, Structural Realism, Unipolarity, Persian Gulf, U.S.

* Ass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and Law at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E-amil: vicent@nuk.edu.tw.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